



月湖鸟瞰图 (吴维春 摄)

斯玉梅

月湖初辟于唐贞观年间(627-649)。唐太和七年(833)，鄞县令王元暉筑它山堰，并引流入城，成为孕育宁波城市的母亲湖。北宋元祐至绍圣年间(1086-1098)，明州知州刘淑、刘理相继浚治月湖，形成“十洲”胜景。南宋《宝庆四明志》记载：“四明之所以得名者，以有日月二湖。月湖之所以奇绝者，以其中有十洲。十洲，神仙所居也。”月湖成为城市最美的景观，也从此成为世世代代宁波士子的精神家园。

月湖是水利之湖，景观之湖，更是文化之湖。从北宋王安石于月湖边创办县学，延聘名儒“庆历五先生”，宁波文脉初开；南宋“淳熙四先生”讲学湖上，形成宁波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学派——“四明学派”；宋末元初，鸿儒王应麟居于月湖，形成“深宁学派”；再至明末清初，黄宗羲讲学月湖，月湖边的万斯大、万斯同、全祖望，成为“浙东史学派”重要代表。而“浙东史学派”，使宁波的学术思想取得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成就。

在月湖厚重的文化传统中，藏书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支。南宋时世家大族环湖而居，书院、藏书楼、诗社林立，我们且撷取一二，重温南宋月湖藏书的盛况。

皇子藏书遗甘棠

淳熙元年(1174)，南宋孝宗皇帝的二儿子魏王赵昀判明州。赵昀为人宽厚，精于吏治，心系百姓。他下令暂停所属县邑的田租，用这些田租来办学，极大地推动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。赵昀于月湖柳汀建涵虚馆为住宅，馆内有藏书4092册，多为世间不传之本。魏王的王妃卫姬，长于书法，东乡太白山口原有锁翠亭，匾额即为卫姬所书。淳熙七年(1180)二月，35岁的魏王卒于明州任上。明州百姓为他建祠立碑，以纪念其德政。

丞相史浩在《祭湖心广福院魏王祠文》中回忆了与魏王的交往：“洪惟昭代，克生贤王。王出为郡，我还故乡。邂逅相遇，念旧不忘。或陪燕俎，或和诗章。间得共醉，乐未渠央。我忽环召，再坐庙堂。王犹符竹，誉满襄黄。”魏王来明州之际，正是史浩第一次罢相赋闲在家之时，两人诗酒唱和，其乐融融。淳熙五年(1178)，史浩复拜右丞相离开明州，至淳熙十年(1183)史浩致仕返乡，与魏王已是天人两隔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怎不令人感慨：“夫何属疾，趣驾襄黄。及我告归，王已穴藏。坦然坛壝，庶食此方。顾瞻貌像，宁不懔惶。惟王明德，荫美甘棠。”

清代史学大家全祖望在《皇子魏王(愷)涵虚馆》诗中写道：“东西憧憧桥，朱邸开涵虚。天公留得彩虹影，迎向双桥逐使车。贤王宾从尽儒雅，时携卫姬来学书。藏书万卷垂百世，隔岸香火精蓝俱。”柳汀有憧憧双桥连接东西两岸，如两道彩虹落于湖上。精蓝指寺院，柳汀南面的花屿上有宋代明州四大律寺之一的湖心寺，魏王祠就在湖心寺内。魏王去世时有旨，



留存的藏书 (吴维春 摄)

藏书全部赐给明州，近五千册的书，换算成“卷”的话，大概有一万卷，“藏书万卷垂百世”即指此事。

淳熙七年(1180)三月，范成大以“中大夫兼沿海制置使”任职明州，修葺九经堂，将藏书奉于九经堂之西偏，后来范成大又将这些书籍奉藏于明州府学御书阁内，数量之多，整整占了十个大书橱。这些皇家藏书，成为宁波藏书中的精品，为推动宁波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碧沚深居十二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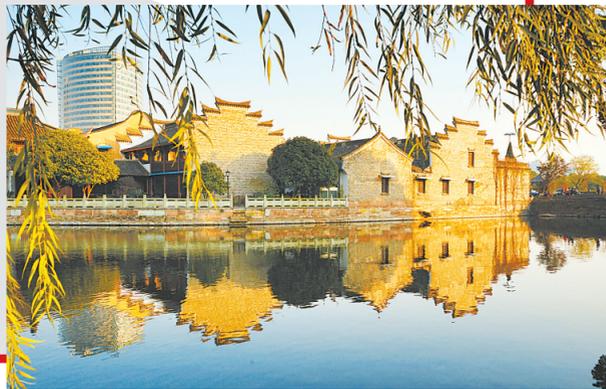
月湖菊花洲，南宋时是丞相史浩的寿乐府。史浩两居相位，昭雪岳飞冤案，力荐贤良，力图中兴宋室，是宁波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。史浩致仕归里后，宋孝宗赐月湖菊花洲与史浩为宅，拨银万两为史浩在竹洲建真隐观。“笑呼羨门俦侣，时引宝觞醺醉”“对兹美景，爱清歌妙曲，千钟芳酒”。史浩在尽情欣赏美景、享受生活的同时，大力推动乡邦文化建设。在四明史氏家族经营下，月湖形成“并湖甲第，嵯峨尺五。碧瓦朱甍，更仆难数”的盛景。此时“淳熙四先生”讲学月湖，宁波学术、文化皆荟萃于湖上。

史浩去世后，史浩孙子史守之因不满叔父相史弥远所为，退居月湖。史弥远任南宋丞相长达26年，任相时间之长，为宋代第一。史守之在月湖芳草洲，以藏书读书、研究学问为乐，再请“淳熙四先生”之一的杨简开馆讲学。位于

芳草洲的“碧沚”藏书楼既是杨简讲学之处，也是史守之藏书之所。碧沚藏书楼，被称为“牙签最富”。有如此丰富的藏书资源，杨简曾想在此编撰著述“以正邪说”，可惜未能实现就去世了。同为大藏书家的楼钥，对碧沚藏书楼的评价是“四面楼台相映发，一川烟水自弯环”“旧说夕阳无限好，此中得得夕阳多”，前两句描述碧沚的景观，后两句是对碧沚的仰慕——面对如此丰富的藏书，连夕阳的余晖都徘徊流连，不忍离去。

史守之以高洁的人品为人称道，人称“清修好古之士”。清代月湖边文人宗道认为：“人言史相有诸孙，茅屋一区碧沚存。读书看湖足真意，之子庶几可品论。”全祖望考赞史守之：“何来梧竹清风别，碧沚深居十二郎”“碧梧翠竹，以类相从，庶几德不终湮，而宗衮亦未尝不藉以吐气也”。晚清文献学家，专门为藏书家著书立传的叶昌炽亦盛赞道：“月湖自有甘盘斋，碧沚芳丛早息机。”

身处繁缛世家，碧沚藏书必多秘本精品。著录明代书面的著作《清河书画舫》记载：“宋人小楷《史记》……计十帙，纸高四寸，字类半黍。不惟笔精墨妙，中间绝无讹谬。每帙有‘旧学史氏’及‘碧沚’二印，宋通直郎史守之所用。”碧沚的藏书，无论品相还是内容，都堪称极品。《天禄琳琅续编》记录了清代皇家藏书的精华，其中就有史氏的藏书。据《天禄琳琅续编》记载，清皇室藏书有宋刻《三礼图》以及30卷的《通鉴考异》，上面均有“史氏家传翰林收藏书画图章”印。其中《通鉴考



月湖十洲之一柳汀 (吴维春 摄)

异》上还有“奉华堂记”印。“奉华堂记”印为宋徽宗宠妃刘贵妃所钤用，这表明《通鉴考异》曾是宋皇室藏书。叶昌炽认为：“此本南渡初当在禁闼，史氏懿懿，是以得之”，因为四明史氏的显贵而得御书，遂成家传。

此身愿为书蠹虫

全祖望称月湖“藏书之富，南楼北史”。“北史”，即上文介绍的月湖北端碧沚主人史守之，而“南楼”，则是指月湖南端东楼主人楼钥。楼钥，字宗嘉，初官至参知政事，相当于副宰相的职位。楼钥文辞精博，有文集120卷行世。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称，南宋文章推楼钥与李邴、汪藻为三大家。楼钥为北宋“庆历五先生”之一楼郁的五世孙。楼郁在月湖掌教30年，月湖藏书最早即始于楼郁。南宋建炎年间，宁波惨遭兵祸，偌大的宁波城成为一片废墟，以至楼家“室庐遭毁”“故书无一存者”，因此楼钥藏书可谓白手起家。

楼钥住在月湖西岸烟屿，于东岸竹屿建东楼藏书，并命其楼曰“仰嵩楼”，只是“仰嵩”之名渐趋湮没，后人多以“东楼”呼之。东楼初成之时，楼钥邀请当时在月湖讲学的“淳熙四先生”之一的袁宏登楼。袁宏《絮斋集》云：“楼宣献藏书既富，欲别贮之。执政之次年，东楼始成，聚古今群书其上，而累奇石于前。又取楚公登封令时所藏《嵩岳图》石刻，刻屏其下，仍以‘仰嵩’旧名名之。”楼钥在藏书楼前叠奇石形成景观，以壮书

楼之势。我们今天看到的天一阁藏书楼前的假山，应该与其类似，也许是大藏书家范钦慕先贤之创举而效仿之。

楼钥嗜书如命，这在他为另一位藏书家赵彦逾的题诗中，可见一斑。同样也住在月湖西岸烟屿的资政殿大学士赵彦逾，建了一座三层藏书楼，命名为“重楼”，中间一层专门用于藏书。楼钥《赵资政建三层楼中楼钥书》中写道：“我欲效攀萝意方浓，一朝登眺若发矇。不愿侍公饮十种，不愿舞女纷歌讴。插架三万牙签重，此身愿为书蠹虫！”不要美酒，不要美色，只要与书相伴，时间书香，甘当书之蠹虫！

如果说碧沚藏书之精，源自史氏家族特殊的地位，那么东楼藏书之精，则是楼钥孜孜不倦，不断访求善本，并亲自加以校勘的结果。楼钥的《玫瑰集·跋春秋繁露》有载：“《繁露》行世者，皆不合《崇文总目》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。余老矣，犹欲得一善本。闻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多收异书，属其子弟访之，始得此本，果有八十二篇，前所未见。”楼钥对现行的《春秋繁露》版本不满，但多方访求未果，到了老年仍念念不忘，听说住在金华的同年潘景宪收集了不少异书，于是托人寻访，终于如愿得到了满意的善本。

面对得来不易的藏书，楼钥采取了开明而慷慨的态度，有人借阅或抄录时，总是欣然答应。清初浙东大诗人李邴评其为：“性尤乐易，客有愿抄其书，辄欣然自贻以授。”这种共享的精神，在将奇书异本视为珍宝而不外泄的古代，实在难能可贵。楼钥自己诗中亦言：

月湖·宋时书香

编者按：2018年10月29日，天一阁·月湖景区继溪口风景区后，成为宁波又一处国家5A级景区。

碧波荡漾，绿树掩映，书香芬芳，作为宁波的“母亲湖”，1000多年来，历代鸿儒在月湖边上学、讲学、建书院，一如魏明伦先生在《宁波月湖铭》中所述：“碧沚文风盛，柳汀墨气灵。人间典籍储湖畔，天帝琅嬛降范家。”

藏书是月湖文化的重要一支，而南宋堪称其鼎盛时期。且让我们借助历史人物和史书记载，一起去踏访月湖周边那些曾经巍峨耸立的藏书楼。

“书传传来直到今，读书几似孝标淫。欲君终就九经库，与子平分一片心”“门前莫约频来客，座上同观未见书”，都体现了这种精神。

唯有诗书继世长

“东楼万卷架渠渠，知是楼三学士书。郎若不辞勤汲古，一编委愿供双鱼。”全祖望的《双湖竹枝词》，前两句说的是楼钥的东楼，第三句写的则是大学者王应麟的书籍“汲古堂”。

月湖东岸月湖的东边，是南宋鸿儒王应麟故居遗址所在地。王应麟号深宁，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。一生师表士林，著述宏富。南宋亡后坚决不向元朝称臣，隐居乡里，杜门不出。王应麟在月湖边讲学著述20年，由此诞生的“深宁学派”，对元明清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、多方面的影响。

王应麟所著200卷《玉海》包罗宏富，分天文、律宪、地理、帝学、圣文、艺术、诏令、礼仪、车服、器用、郊祀、音乐、学校、选举、官制、兵制等21门，每门各分子目，凡240余类，囊括了当时科举考试几乎所有的内容，被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为“其贯串奥博，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”；20卷《困学纪闻》被称为宋代三大笔记之首，另两本为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和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。当然我们最熟悉的，还是他编写的《三字经》，风行海内外700多年，是中华文化的代表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。

王应麟的博学，源于父亲王撝对藏书的重视。王撝曾在参知政事余天锡家教授子弟，年终时余天锡要付给王撝酬劳，王撝坚辞不受，而是提出：“吾二儿习词学，乡里无完书，愿从公求尺牍，往借周易、傅内翰、番禺三洪公置往昔习词学者凡二十余家所藏书。”余天锡欣然许之。后来王应麟与胞弟王应凤，相继通过南宋朝极为严苛的博学鸿词科考试，应是得益于父亲的远见。

王应麟故居名汲古堂，堂匾出自其父王撝任崇政殿说书时，宋理宗所赐御书“汲古传忠”。王应麟自己也非常重视藏书。担任秘书监专门掌管国家藏书时，利用职务上的方便，抄录了不少秘府典籍，汲古堂的藏书亦洋洋可观。至王应麟儿子王世昌时，已藏书万余卷。后来藏书不幸毁于火，王世昌废寝忘食，日夜抄写，终于恢复了藏书规模。

当历史的长河漫过堤岸，涵虚馆、碧沚、东楼、重楼、汲古堂……那些曾经的卷帙芸编、牙签万重、雕梁画栋、书院木铎，早已烟消云散，化作了蔓草冷烟。然而，“长惠青葱多带草，遥知呵护有卿云”，这千年的湖水，这千年的书香，已然氤氲了这座城市，浸润了一代代宁波学子。正是这种艰苦卓绝的藏书精神的传承，正是月湖藏书文化的蔚然成风，才有了宁波这座城市的凤骨和精魂，有了中国藏书文化的典范——天一阁。今天，天一阁·月湖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成功创建，更源自此地千年的文化底蕴。重拾城市文化、传承千年文脉，并发扬光大，唯有如此，才不负这一泓深碧、千年书香。